

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转换

——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看

2005-12-6 袁辉初 陈慕姣 阅读763次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中国式的运用。学界以往对毛泽东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研究，主要是从性质方面深入探讨了二者的内在一致性，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从理论来源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决定性影响，从而最终从理论上证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事业是马克思主义的事业，是全人类解放事业的一部分，是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和实践上的中国特色的有机统一。这种解释和说明方式，起到了它所应有的理论作用，彰显了它所内蕴的实际价值。但却明显地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贡献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和足够的说明，这或多或少影响了历史对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的公正评价。本文拟以哲学基本问题为例，来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而且说明这种中国化的实质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具体实践并通过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转换。

一、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到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

在1886年《新时代》发表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二章开头，恩格斯明确地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界定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自此以后，这个科学论断所体现的思维方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发展，理解哲学性质的根本方法。当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恩格斯首先提出和加以阐述的，黑格尔在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史进行考察时，就认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主体——客观思维方式是西方近代哲学的主要问题和主导思维方式。恩格斯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论断为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二是恩格斯正确地阐述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立场上与其它哲学流派主要是一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恩格斯把哲学基本问题三个方面的内容表述为两个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并把对此的不同回答作为划分哲学阵营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者一直到现在还是沿用恩格斯对这两个问题的表述，并根据这两个问题来组织它的内容。结果，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中，把本来不应该排除的辩证法排除在哲学基本问题之外。这就造成了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内容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不相协调。即在哲学原理中有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内容，但对哲学基本问题只进行了本体论（第一个问题）意义上和认识论（第二个问题）意义上的理解。显然这是只从形式上把握恩格斯所阐释的哲学基本问题的结果，造成了完全可以避免的不必要的误读。这种误读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把超越了时间先在性的“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与只具有时间先在性“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等同。其实，“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时间先在性，同时具有逻辑先在性，而“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中“物质”只具有时间先在性。虽然后者可以鲜明地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但是却可能导致“反思”这种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丧失。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误读第三个方面表现在把“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理解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现在流行的认为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的学说”、哲学是“关于思维规律的科学”就是这种误读的直接后果。

其实，恩格斯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中表达得很清楚，只要我们不是形式上的理解，也不是断章式的把握，就能够完整、准确地理解恩格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科学论断，把握哲学基本问题真理性的条件。“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表明：第一，恩格斯是辩

证考察整个哲学的结果,从时间方面来说,是指历史上的所有哲学,从空间方面来说,是恩格斯特别关注的近代哲学,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成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第二,近代哲学的主导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全部哲学的不同发展时期和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只是到了近代主要是通过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方式体现出来。

恩格斯通过正面阐述和对费尔巴哈与施达克的批评中阐明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真理性条件。在恩格斯看来,哲学基本阵营和哲学基本派别是依哲学家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问答来划分的,也就是说,“思维”和“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只有在划分哲学基本派别时才具有绝对的、完全的意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是在回答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才彰显出来的,并且是由前者所厘定的。恩格斯还特别强调,这两个词所具有的完全意义就是指称“唯物”和“唯心”两大基本哲学阵营。既不能在别的意义上使用,也不能给它们加上别的意思,否则就会失去真理性。

通过对恩格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科学观点的分析,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思想中把握的现实,是时代发展、历史变换在思想中的反映;而时代发展的主题、历史变换的主要矛盾,在哲学思想中也就成为主导思维和主导问题,成为哲学反思的“兴奋点”。这也就深刻地说明了哲学思想的阶段性特征和民族性特色,而这种阶段性特征和民族性特色,是通过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的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呈现出来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体现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同一性。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了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创造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中国式创造性转换的结果。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与观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点与实际情况,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创造性地转换为“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在这里毛泽东就以主观和客观关系问题作为区分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根本标准。

二、主观和客观关系问题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问题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内在统一的科学体系。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四大块”模式来构建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并无不可,亦无可厚非,至少可以从模式上充分体现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一致性。但是却不能充分有效地反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特点,即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这一特色:“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的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自己也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4〕这里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特色”和“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其实就是指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也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个性和独特性。要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意义上构建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就应该强调和凸显这种特色,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认识其矛盾的特殊性,从而真正地把握事物。而这种特色、这种矛盾特殊性、这种理论个性,可以通过哲学基本问题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创造性转换得到充分体现。在富有创造性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中,哲学基本问题不是经常性地以思维和存在或物质和精神的方式得到呈现,而是以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方式得到展现。主观和客观关系问题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问题,可以从历史合理性、理论合理性和现实合理性三个角度来理解。

首先从历史合理性来看,哲学基本问题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历史时代和历史发展的不同空间或哲学家那里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生产力不发达的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构造,并且受到自己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有了灵肉二分的思维和灵魂不死的观念。哲学基本问题就以灵魂和肉体的方式表现出来,进而从肉体扩展到各种具体的物质形态,这就是朴素唯物主义发展阶段的哲学基本问题。随着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自然科学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哲学思想也发展到更高的阶段,与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同步,哲学基本问题也发展到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从形态多样的物质形式发

发展到多样性统一的物质形态,从物质的各种具体形态发展到多样性统一的物质形态,即从“多”到“一”,进而体现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正是从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恩格斯作出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论断,并认为“象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唯物主义形式的改变,自然也包含哲学基本问题表现形式的变化。因此历史发展使哲学基本问题在马克思时代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方式表现,时代进步使哲学基本问题在毛泽东年代以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方式表现亦无不可。

另外,哲学基本问题在不同地域和不同哲学家那里是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是哲学思想的民族性和理论个性的必然体现。哲学的民族性或地域性可以从世界三大哲学传统的基本范畴的历史演化明显的看出。中国哲学、古希腊哲学和印度哲学在各自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彼此不同的哲学范畴、形成了彼此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构建了彼此各异的哲学体系。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讲“物质和精神”,在中国哲学传统中讲“理气”,而在印度哲学传统中讲“色心”、“名相”。同一阵营的不同流派也有所不同,陆王心学讲“心性”,程朱之学讲“理气”;主观唯心主义讲“观念”(贝克莱认为物是“观念的集合”,“存在就是被感知”),客观唯心主义讲“绝对精神”(黑格尔认为物质世界是绝对观念的外化)。而不同的哲学家总是属于两大基本哲学派别中的不同哲学流派,因而哲学基本问题在其理论建构中也就表现各异。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唯物、辩证共同性的基础上,使主观和客观关系问题成为自己哲学体系的基本问题。

其次,从理论合理性来看,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式运用,是时代发展和中国特殊国情的哲学把握,是思想中把握的中国现实。这种现实的特殊性,即客观事实或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无论从理论内容还是从表现形式来说,具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个性。从内容方面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不能不考虑时代的现实影响,人类历史的时代发展不能不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有所表现,但这种表现是通过理论个性而不是理论共性的方式体现,在这个意义上,个性是决定性方面,是内容方面,共性是形式方面,共性只能存在于个性之中并通过个性体现出来,否则共性就成为一种抽象。但是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它始终关注和着力解决的是时代影响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发展道路问题、民族民主革命完成问题、中国人的解放问题、新世界的创造和建设问题。对这些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答构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从表现形式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目的是从哲学上论证人类解放和历史进步的必然性,说明人性异化和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暂时性,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哲学的解释和说明,同时从根本上对唯心主义以彻底的打击,防止唯物主义的庸俗化。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大多以“批判”的形式出现。毛泽东哲学是为了解决中国过程中的战略策略问题、思想路线问题、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等问题,也就是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主观和客观相脱离的主要以主观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非马克思主义。主观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主要表现在: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左”倾和右倾,在军事上主要表现为冒险主义和保守主义,在思想路线上主要表现为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在政策和策略上主要表现为冒进和尾巴主义。所以在毛泽东的主要哲学著作中,大多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而进行的理论阐释,指出非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但这种说明的方式大多不是以学理方式,而是以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的方式进行的。这是毛泽东充分考虑了中国现实国情的结果。毛泽东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对立的发展观称为“宇宙观”;把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通过知和行的关系进行阐述;把矛盾的绝对性和相对性通过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来说明;把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的非马克思主义用主观主义等来指称;形式主义用中药铺、八股文来形容等,都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范畴的创造性转换,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创造性。而这种创造性在哲学体系中就构成其特殊性。正因为有这种特殊性,才能使毛泽东哲学思想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特定发展阶段。

再有从现实合理性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理论成果,必然体现“中国同志”的实践方式、价值理念和行为模式,同时也必然体现不同于别的国家或地方的“中国情况”,还必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影响,所有这些因素所构成的客观现实,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实践性。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纯粹理论创造或构建的结果。作为直接从事伟大革命实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虽然深知理论对于实践的重要性,但是严酷的生存现实使他们没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来进行专门的理论探讨,有的只是实践进程中必须及时解决的各种实际问题,从而使毛泽东哲

学思想具有直接的现实性。第二,现实的革命实践催生了现实性的理论,理论同时也反过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完善和发展,从而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理论与实践的直接统一性。第三,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性使毛泽东哲学不仅得以产生,同时在革命实践中得以检验,其真理性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成功而日益得到丰富。第四,毛泽东主张哲学应当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教授书斋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历史的现实发展中既反对主观主义,又反对客观主义;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既反对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又反对右倾错误,从而保证了自身理论的真理性。始终坚持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独立观察、分析和处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问题。

三、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经过毛泽东的创造性转换,成为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虽然没有独立的哲学著作专门论述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但是无论是从毛泽东研究哲学的理论活动还是从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实践活动来看,都体现了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关系,既唯物又辩证地解决了二者的统一关系。

在毛泽东的著作、讲话或读书笔记中,虽然也讲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但大量使用,讲得最多的是主观和客观这一对基本范畴。在毛泽东那里,“主观”指的是人们“思想等主观的东西”,有时也称“主观性”、“主观精神”、“主观意识”或“主观的指导”、“主观想象”,具体来看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第二是路线、方针和政策等;第三是计划、方案和办法等。同时毛泽东把“我们头脑以外”的“一切客观实际的东西”都指称为客观,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客观包括群众的需要和觉悟。“客观”在毛泽东那里有时也称为“客观性”、“客观物质”、“客观存在”或“客观规律”、“客观实际”。从主观和客观的划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是坚持唯物辩证立场上的主观和客观的实践统一论的。以“头脑”作为主观和客观划分的绝对界域;“头脑以外”的就是客观,这就避免了机械性与形而上学,从而为群众的“需要”和“觉悟”成为“客观的”提供了可能性。从而揭示了客观不是纯粹的自在意义上的客观,而是实践意义上的客观事实和客观实际。这就与客观主义划清了界限。毛泽东在分析“左”倾机会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的原因时,从哲学上进行了揭示认为是“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认为“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毛泽东虽然坚持客观对主观的决定作用,制约作用,但并没有抹煞主观的能动作用。反而十分强调人的“自觉能动性”、“主观能动性”、“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认识的能动作用”等,认为“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来的”、“一切事情都是要人做的”。并且把人的自觉能动性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主观对客观起决定作用。这就又与过分强调主观作用,把主观绝对化的主观主义区分开来。主观这种决定作用,在革命战争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战争的胜负,固然是由战争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的,但这只是提供了战争胜利的可能性,要使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毛泽东认为,就需要正确的方针、灵活的战争策略和主观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就起决定作用了。

客观决定主观,要求主观符合客观,反映客观,这是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要求。主观和客观关系问题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问题,其第二个问题就是主观和客观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毛泽东不仅肯定主观能反映客观,而且认为主观能转化为客观,客观能转化为主观,并且把这种同一性的转化用更直观的“变”这一范畴来指称。既体现了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的一致性,又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独特创造性。早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认为一个具体的认识运动过程就是一个使主观的理性认识变为客观事实的过程,就是一个主观转变为客观的过程。“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同时认为认识的真理性检验过程,认识是否和客观过程的规律相符合,其实就是“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也就是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

对于主——客互变的思想,毛泽东在1963年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文章中表述得更为直接,明确提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也就是客观可以变成主观,主观可以变成客观。并且认为这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有些人对此“觉得不可理解”,是因为没有学好“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恩格斯在对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批评中也表述了类似的思想,认为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可以使“自在之物”转变为“为我之物”。可见,客观可以变成主观,主观可以变成客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是对主观和客观关系的同一性问题的彻底的、唯物辩证的回答。

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在强调实践是认识源泉和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根本标准的基础上,认为实践是实现主——客互变的基础和中介,主——客内蕴的互变可能性是通过具体的历史实践变为现实的。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关于“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和列宁的关于“交错点=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的思想,总结了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把实践界定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动”,体现了实践的客观性,主体性和辩证本性。在具体的认识过程中,通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方法达到对客观的本质性、规律性的认识,再通过这种规律性的认识来指导具体实践,经过多次的反复实践,而达到预想的结果,在实现对客观世界改造的同时实现对主观世界的改造。只有通过实践,主观才能认识客观,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检验主观是否符合客观。在毛泽东看来,主观和客观是相互渗透的,二者的互变在社会实践中实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既与主观主义的主观标准区分开来,又与客观主义的纯粹客观标准区分开来,坚持了实践标准问题上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所以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袁辉,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助理,讲师,博士。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年第5期

网站编辑:宋扬

[关于我们](#) | [服务范围](#) | [网站合作](#) | [版权声明](#) | [网站地图](#)

Copyright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Sichuan Social Science Online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信息网络中心设计制作

mail: sss@sss.net.cn

蜀ICP备05003527号